

美援文藝體制下的《文學雜誌》 與《現代文學》

王梅香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中文摘要

既有的台灣文學史論述中，美國權力對於台灣文壇的介入僅停留在「贊助」(patron)層次，亦即台北美新處贊助《文學雜誌》(*Literary Review*)和《現代文學》(*Modern Literature*)雜誌的發行。然而，對於台北美新處與上述兩份刊物的關係始終沒有加以釐清。本研究使用美國國家檔案局的資料，也是學界首次向該單位申請該批資料的解密，試圖說明上述兩份刊物，除了通常認知的學院派刊物、現代主義文學雜誌等外，它們在美援文藝體制底下還存在另外的功能：亦即作為美國權力對東南亞地區的文學宣傳品。《文學雜誌》是台北美新處中文計畫(Chinese-Language Program)的一部分，是其所支持「隱蔽」(unattributed)的中文月刊；而《現代文學》則由台北美新處贊助特定期數，贊助的刊物亦為其所用。透過本研究，除了重新審視和修正《文學雜誌》在台灣文學史的位置，也將上述兩份刊物置入戰後文化冷戰的宣傳結構中，可以看到一向被視為現代主義的「純」文學刊物，在美援文藝體制的運作之下，以現代主義的「去政治」、「超功利」的面貌，針對東南亞華人知識分子進行反共的政治宣傳。

關鍵字：文化冷戰、文化宣傳、美援文化、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文學

Literary Review and Modern Literature under the U.S. Aid Literary Institution

Wang, Mei-hsiang
PhD. Candidat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discourse of existing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U.S. Power intervened the Taiwan literary scene by means of patronage, which meant that USIS of Taipei sponsored the publication of literary magazines – *Literary Review* and *Modern Literature*.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IS of Taipei and these two publications never be clarified. By means of using the files of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which was the first application for data release in academic unit, this paper tried to explain that these two publications played the role of literary tools for propaganda toward the Southeast Asia under the U.S. literary institution except the stereotypes of the academic journal and Modernist Literature. *Literary Review* was one of Chinese-Language Program and an unattributed monthly journal of Taipei USIS; *Modern Literature* was also supported and broadcast by this unit. Through the research, the paper re-examined and revised the position of *Literary Review*, and placed these two publications in the propaganda structure of postwar cultural Cold War. It argues that the so-called “pure” literary journals in the face of “depolitical” or “ultra-utilitarian”

conduct anti-communist political propaganda towar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Southeast Asia under the operation of U.S. Aid literary institution.

Key words: Cultural Cold War, Cultural propaganda, U.S. aid culture, Anti-communist literature, Modernist literature

美援文藝體制下的《文學雜誌》 與《現代文學》*

一、台灣文學史中的《文學雜誌》與《現代文學》

《文學雜誌》與《現代文學》在台灣文學史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即便不同文學研究者對於兩份刊物的分析面向不盡相同，但對其文學史地位的肯定卻是不約而同。本研究的主軸是兩份刊物與美國新聞處（以下簡稱美新處）的關係。以下透過簡要敘述，先回顧兩份刊物在台灣文學史中的位置。分別從「學院派」、「英美現代主義」、「自由主義」以及「美國新聞處」四個面向說明。

1956年9月20日，《文學雜誌》由台大外文系教授夏濟安（1916-1965）於台北創刊，直到1960年8月20日結束，共出版48期。因為編者身分及投稿作者大都出自學院，因此，這份雜誌被視為是「學院派」刊物。梅家玲對學院派提出如下的界定：「所謂『學院派』文學雜誌，乃是由學院中的教授文人所創辦，以學者及青年學生為編輯及寫作主力，並且力圖將學院中的研究與教學成果，轉化為出版文化產品，走出學院，進入一般閱讀市場，刊物因此多具理想性與學術性。」¹梅家玲認為，《文學雜誌》善用台灣大學的學術資源，促成當時文化場域的改變，為台灣文學開創新的走向。

然而，關於《文學雜誌》的創刊一直有個傳聞，就是這份五〇年代相當重要的現代主義文藝刊物，是在麻將桌上談出來的。吳魯芹在〈瑣憶「文學雜誌」

* 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提供本文懇切的修改意見，謹此表達由衷的感謝。

¹ 梅家玲，〈夏濟安、《文學雜誌》與台灣大學——兼論台灣「學院派」文學雜誌及其與「文化場域」和「教育空間」的互涉〉，《台灣文學研究集刊》第1期（2006年2月），頁61-103。

的創刊與停辦》一文中提到，《文學雜誌》不是在「負有時代使命」或者「啟迪後進」的嚴肅氣氛下產生的²。他說：

談「文學雜誌」不談麻將，是無從談起的，因為「文學雜誌」產生在麻將桌上，如果有所謂編輯政策，那也是決定在麻將桌上，到最後關門大吉也是在麻將桌上眾謀僉同，草草收殮的，從它胚胎到呱呱墜地，以及每月二十日亮相一次的辛苦過程中，伴奏的不是古典音樂，而是洗牌打牌的碎珠落玉盤的聲響。³

當時，夏濟安有打橋牌跟麻將的嗜好，習慣每隔一星期的週末和劉守宜到崔書琴先生家中打橋牌，然後到吳魯芹家打麻將。後來夏濟安打麻將的興趣日漸濃厚，幾乎每星期六都到吳魯芹家打麻將，劉守宜是明華書局的老闆，夏濟安跟吳魯芹常一邊打牌一邊替劉老闆出主意，希望他的書局「格局」能大一點，在牌桌上邊打邊談，談出了一個結果，決定出版《文學雜誌》，風格追隨朱孟實（朱光潛）編的《文學雜誌》⁴，該構想便在「吳下流」（吳魯芹、夏濟安和劉守宜）三人的麻將桌上促成。不過，根據吳魯芹的回憶，真正讓《文學雜誌》成為「定局」的卻是林以亮（宋淇），經林以亮大刀闊斧的計畫，讓《文學雜誌》的工作分配具體成形。

根據學院派知識分子的回憶，《文學雜誌》本是夏濟安等人的構想，而一群人就這麼志同道合地聚在一起，開啟了戰後台灣現代主義中英美的這條發展路線。追隨著《文學雜誌》，《現代文學》於1960年3月創刊，一方面是戰後新世代的文學實踐，尤其是在現代主義小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學院派知識分子創作的延續⁵。

《文學雜誌》、《現代文學》除了是「學院派」刊物，也是英美現代主義的代表。1956年2月紀弦組織現代詩派，代表的是德法現代主義的發揚，而夏濟安等人的英美文學背景，則讓《文學雜誌》帶有現代主義的風格，同時，又有

² 吳魯芹，〈瑣憶《文學雜誌》的創立與停刊〉，《聯合報》，1977年6月1日，第12版。該文後選入吳魯芹，《低調淺彈——瞎三話四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6年）。

³ 同註2。這段話幾乎原文重現於1982年吳魯芹接受鐘麗慧的訪問中。鐘麗慧，〈老漢忘年不老·飛觴把酒言觀中距離訪問吳魯芹〉，《聯合報》，1982年8月7日，第7版。

⁴ 參考吳魯芹，〈瑣憶《文學雜誌》的創立與停刊〉，同註2。

⁵ 陳若曦在《陳若曦自選集》中提到：「我最先想辦《現代文學》是存著給《文學雜誌》接棒的意思。」她明確指出兩份刊物之間的傳承關係。陳若曦，〈後記〉，《陳若曦自選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82年），頁194。

傳統文學的影響。關於這份雜誌英美現代主義的部分，包括：〈艾略特戲劇的精神中心〉、〈現代藝術與存在主義〉、〈現代英國小說與意識流〉、〈論批評家影響下的美國現代小說〉等⁶。陳建忠認為：「夏濟安的《文學雜誌》對台灣現代主義文學創作的影響，亦具體表現在這些譯介的文章當中，相關的重要作家有：里爾克、波特萊爾、亨利·詹姆斯、卡謬、海明威、艾略特、托馬斯·曼等，幾近涉及西方現代主義的各個時期和流派。」⁷現代主義的譯介部分，後來成為《文學雜誌》的特色。許俊雅也提到《文學雜誌》是「現代派先聲」，「其成就是以推崇的態度評介了諸如卡謬、艾略特、喬哀思等一些西方現代派大師的作品和理論，以及存在主義、象徵主義、意識流等西方現代哲學和文學的流派與觀點。」⁸關於《文學雜誌》譯介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理論，並以新批評手法進行作品分析，也影響了後來的《現代文學》和《中外文學》等學院派雜誌。

若將《文學雜誌》放在五〇年代反共文藝的脈絡中，它被視為與《自由中國》同屬「自由主義」色彩濃厚的雜誌，由此觀之，《文學雜誌》可視為《自由中國》的「文學版」。侯作珍在她的博士論文中，論述自由主義與台灣現代主義崛起的關係⁹。她認為《文學雜誌》秉持言論自由、創作自由的態度，堅持純文學的路線，該刊作家與《自由中國》具有高度重疊性，因此，將戰後台灣的英美現代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傳統聯繫起來。陳芳明在《台灣新文學史》一書中指出：《文學雜誌》與《自由中國》是相互結盟的刊物，他們的作者互相支援，也相互重疊。雙方也舉行過茶會聯誼，並且有過聯合行動¹⁰。《自由中國》的文藝欄主編聶華苓，邀約的作家多以自由傾向的作者為主，這些作家後來與《文

⁶ Peter Kline 著，葉維廉譯，〈艾略特戲劇的精神中心〉，《文學雜誌》7卷3期（1959年11月）；William Barrett 著，朱南度譯，〈現代藝術與存在主義〉，《文學雜誌》6卷3期（1959年5月）；William York Tindall 著，朱南度譯，〈現代英國小說與意識流〉，《文學雜誌》6卷5期（1959年7月）；Malcolm Cowley 著，劉紹銘譯，〈論批評家影響下的美國現代小說〉，《文學雜誌》7卷1期（1959年9月）。

⁷ 陳建忠，〈「美新處」(USI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國文學報》第52期（2012年12月），頁226。

⁸ 許俊雅，〈回首話當年（下）：論夏濟安與《文學雜誌》〉，《華文文學》第54期（2003年1月），頁55-56。

⁹ 侯作珍，〈自由主義傳統與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崛起〉（台北：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

¹⁰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冊（台北：聯經出版社，2011年），頁340。

學雜誌》也有密切聯繫。從侯作珍到陳芳明，可以看到論者從自由主義中找尋台灣戰後現代主義崛起的原因，尤其是如何從反共文學轉向現代主義。對陳芳明而言，現代主義者的集結乃為了「抗拒」官方文藝政策的領導，亦即台灣現代主義是在反對反共八股與官方的領導下發展起來。

但本文的論點與上述的觀點不同，從閱讀的美國國家局檔案中，本文認為：在「美國人的規畫」中，《文學雜誌》原本即是為了「反共」而生，《現代文學》是為了「反共」而為台北美新處贊助並傳播東南亞（對個別學院派行動者來說，他們本身如何思考，這是另篇文章的問題，本文僅聚焦於美方觀點來觀看《文學雜誌》與《現代文學》）。易言之，這兩份刊物不僅沒有抗拒官方文藝政策，而且還是間接地「支持」官方文藝政策。至少在美新處的思考中，台灣的英美現代主義崛起和傳播，與美方的冷戰反共宣傳無法脫離關係。

此外，陳芳明認為，戰後台灣現代主義的發展應該分成前後兩期來看：前期指的是以紀弦為首的現代派，主要是以法國現代主義為主。到了後期階段（1956-1960），美國現代主義才逐漸占上風，而這種趨勢非常明顯地表現在夏濟安所主編的《文學雜誌》之上。現代主義與美援文化的掛勾，必須到了五〇年代的後半階段才看得清楚¹¹。不過，對於美援文化和現代主義的論述，缺乏直接而有力的論證。陳建忠的〈「美新處」（USI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一文，便是嘗試對於陳芳明所未解決的問題，提出他的觀點。他認為：「陳芳明提出了冷戰、美援文化、文化帝國主義術語，為讀者布置了一個宏觀的歷史舞台，雖然未嘗具體描述美援文化對台灣文壇的介入過程，惟相較於先前的文學史著作，卻也難能可貴。」¹²不過，陳建忠在提及《文學雜誌》與美新處的關係時，所憑藉的材料仍是美新處出版的刊物以及余光中的回憶，這也是一直以來處理美援文化與現代主義關係之間的唯一材料。

根據余光中的看法，《文學雜誌》受到美國人的支持而發展、延續下去，但此說法目前只有余光中提過，後來研究者在陳述《文學雜誌》與美新處的關係

¹¹ 同註 10，頁 318。

¹² 同註 7，頁 214。

時，往往引述余光中的回憶（如陳建忠¹³、許俊雅¹⁴等人），一直以來，並沒有其他「直接證據」證實余光中所言為真。余光中提到：《文學雜誌》的台前人物雖然是夏濟安，可是吳魯芹才是幕後的大功臣，吳魯芹的本職是在「美國新聞處」，職位甚高，尊於其它的中國職員，吳魯芹因為跟夏濟安及劉守宜的交情深厚，而去說服美國新聞處處長 Richard M. McCarthy「逐期」支持《文學雜誌》，所以《文學雜誌》才能出刊維持那麼久，而接下來的《現代文學》也是因吳魯芹的賞識，而得到美新處相當的扶掖¹⁵。

關於《現代文學》接受贊助的事情，已是人盡皆知，但也從來沒有人能夠清楚地描述這個過程，以及被台北美新處買走的這些雜誌最後流落何方？以致即使過了半個世紀，關於《現代文學》的資金問題，及其與台北美新處的關係，仍於 2011-2012 年引發一場軒然大波。事情的經過如下：2011 年 5 月 20 日，《台灣新文學史》的作者陳芳明教授於台北市的紫藤廬發表演說，講題為〈台灣的族群飄移與民國記憶〉，其中有一節「台灣現代主義運動的意義」，談到台灣在五〇至七〇年代，如何受到美國政經方面的影響控制、文化方面的侵略，以及美國新聞處扮演的角色，尤其是現代主義文學的引進，他如此結論：「白先勇創辦《現代文學》雜誌，我們如果知道它背後是怎麼一回事的話，也覺得很掃興，事實上是美國新聞處提供資金讓他去辦這個雜誌。」¹⁶引起當年《現代文學》作家群的重視，陳若曦、白先勇和歐陽子¹⁷分別就這段歷史提出他們的看法。

2011 年 11 月 12 日，陳若曦在〈誰要辦《現代文學》？〉一文揭示當年創辦《現代文學》的祕辛，及雜誌的經費來源。這篇文章強調的重點是：《現代文學》和台北美新處的關係，僅止於當時美新處處長 McCarthy 購買兩期《現代文學》雜誌而已¹⁸。隔年 3 月 12 日，白先勇於《聯合報》上發表〈《現文》憶往——《現代文學》的資金來源〉一文，他提到，陳芳明所說的完全不是事實，美新處從來未供給《現

¹³ 同註 7，頁 227。

¹⁴ 同註 8，頁 58。

¹⁵ 余光中，〈愛彈低調的高手：遠悼吳魯芹先生〉，《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83 年 8 月 25 日，第 8 版。余光中，《茱萸的孩子》（台北：天下文化，1999 年），頁 57。

¹⁶ 陳芳明，〈台灣的族群飄移與民國記憶〉，《傳記文學》99 卷 4 期（2011 年 10 月），頁 66。

¹⁷ 歐陽子，〈關於《現代文學》創辦時期的財務及總務〉，《聯合報》，2012 年 3 月 13 日，第 D3 版。

¹⁸ 陳若曦，〈誰要辦《現代文學》？〉，《聯合報》，2011 年 11 月 12 日，第 D3 版。

代文學》資金辦雜誌，只買過一些《現文》，他們跟美新處的關係僅止於此¹⁹。白先勇的擔憂是，《現文》最值得驕傲的地方就是保持文學獨立的尊嚴，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干擾，不管左、右或者外國，他們怎麼可能會為「美帝」做任何宣傳。對白先勇來說，文學至高無上，文學是「大寫」的，絕對獨立，不應受任何政治勢力干擾。總之，《現代文學》和台北美新處的關係，僅止於當時美新處處長 McCarthy 購買兩期《現代文學》雜誌而已，美新處並沒有提供資金給《現文》同仁創辦雜誌。

既有對於兩份刊物與美新處的論述有兩項侷限：首先，大部分的論述分析倚賴作家們的回憶，如學院派作家。其次，訴諸個體性的成就（如吳魯芹的推波助瀾），而忽略刊物社會性的存在（如兩份刊物與美新處的具體關係）。本研究使用當年台北美新處的相關檔案，希望能夠尋求歷史的解釋。在美援文藝體制的運作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台北美新處曾對《文學雜誌》做過詳細的調查報告。從美援文藝體制的運作邏輯而言，美方只針對自己機關的出版品，如《學生英語雜誌》（*Student Review*）²⁰或《豐年》（*Harvest Pictorial*）²¹等美方資金支持的雜誌進行調查，因此需要進一步思考：為什麼美方要調查《文學雜誌》？這牽涉到《文學雜誌》與台北美新處的具體關係。

二、美援文藝體制下的《文學雜誌》

所謂「美援文藝體制」一詞，並非筆者所獨創，而是受到陳建忠〈「美新處」（USI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一文的啟發。他認為，所謂的美援文藝體制是五〇年代，自域外移入，制約作家在意識形態和文化想像的趨向，相對於國民黨文藝體制（剛性體制），美援文藝體制是一種「軟性體制」，促使台灣文學往有利於美國或是西方的世界觀或美學觀，發展出一種純粹美學的思考和寫作方式²²。

¹⁹ 白先勇，〈《現文》憶往：《現代文學》的資金來源〉，《聯合報》，2012年3月12日，第D3版。

²⁰ 關於《學生英語雜誌》（*Student Review*）的研究可參考：李義男，《美新處「學生英文雜誌」內容分析：該刊傳播目的為技術探討》（臺北：政大新聞所碩士論文，1970年）。

²¹ 關於《豐年》（*Harvest Pictorial*）的研究，可以參考蔡明諺，〈製作豐年：美國在台灣農村的文化宣傳策略〉，「媒介現代：冷戰中的台港文藝學術研討會」論文（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2013年5月）。

²² 同註7，頁211。

美援文藝體制中的台北美新處，對自由中國在地生產的雜誌扮演推介的角色。誠然，其主要用意並非單純協助這些刊物，此一舉動背後更深層的目的是——透過在地刊物「宣傳」和「美化」自由中國。而《文學雜誌》的創辦與《現代文學》的傳播，必須置入美國冷戰時期東南亞的中文計畫中思考，方能更清楚地看出兩份刊物對於美新處的意義。

在美援文藝體制計畫下的台灣雜誌，可以概括為兩大類：一是受到美新處資金支持、推介的，二是由美新處購買轉贈其他海外的美新處。前者如《豐年》、《文學雜誌》等，後者如《現代文學》、《文星》等。然而，不管有無資金介入，台北美新處此舉乃是希望透過政治力量，宣傳自由中國文學、文化的進步性和現代性，主張自由中國的文藝自由、創作自由和純粹美學，透過這種「去政治」的作法以達到「政治上」的宣傳目標。

美援文藝體制下的《文學雜誌》不僅受到台北美新處的推介，而且其本身就是美新處中文計畫的一部分。此點認識的重要性在於：《文學雜誌》在美國人的建議和金援下，由在地出版商劉守宜所創辦的。從這個角度來說，美國人透過《文學雜誌》開啟戰後台灣的英美現代主義。

要揭開《文學雜誌》在美新處計畫中的位置，必須從兩份報告談起：一是1960年2月5日，台北美新處代理處長 John A. Bottorff（司馬笑）向美國新聞總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以下行文簡稱 USIA）提交的評估報告，名稱是“Survey of Taipei Chinese-Language Publication: *Literary Review*”（以下簡稱「Bottorff 評估報告」）。該報告實際的調查時間始於1959年9月。一般認為《文學雜誌》於1959年7月夏濟安赴美之後逐漸式微，1960年8月20日停刊。換句話說，該報告進行調查的時間點，正好在《文學雜誌》停刊之前。本研究認為，該次調查的用意，乃是為了確認《文學雜誌》出版和傳播的成效，是《文學雜誌》能否存續的關鍵。藉該調查報告，可以理解台北美新處對於《文學雜誌》的刊物定位、功用和達成的整體效果之評估。

另外一份關鍵的報告是1961年3月28日，台北美新處處長 McCarthy 向 USIA 提交的年度報告，名稱是“Publications Annual Report (January-December 1960)”（以下簡稱「McCarthy 年度報告」）。該報告提交的時間點是在《文學雜誌》

停刊之後，在該報告中，《文學雜誌》被放在 E 部分：終止服務（Discontinued Services）中，主要報告 1960 年間台北美新處生產或支持的刊物，其因預算和其他原因停止的刊物。透過 McCarthy 的報告，可以一窺台北美新處對於《文學雜誌》的支持始末、刊物定位和停刊原因。

先從時間較早的「Bottorff 評估報告」，來重新理解《文學雜誌》。Bottorff 報告主要分為三個部分來談：

第一部分，對台北美新處而言，《文學雜誌》是台北美新處「隱蔽」的中文月刊。

In September 1959, we initiated a survey of *Literary Review*, **a USIS Taipei unattributed Chinese monthly publication**, as a part of this post's over-all program planning and evaluation.²³（粗體、底線為筆者所加）

1959 年 9 月，我們開始對《文學雜誌》進行調查，這份雜誌是台北美新處「隱蔽」的中文月刊。這份調查將作為台北美新處整體計畫規畫和評估的一部分。

既有對於台北美新處出版品的理解就只有《學生英文雜誌》²⁴，後來增加了《自由世界畫報》（*Free World Pictorial*）²⁵，現在必須再增加《文學雜誌》。關於《文學雜誌》和台北美新處的關係，過往幾乎都依循余光中在〈愛彈低調的高手——遠悼吳魯芹先生〉中的回憶。余光中說：「如果不是吳魯芹去說服美國新聞處處長 McCarthy 逐期支持《文學雜誌》，該刊可能維持不了那麼久……。」²⁶該說法持續被引用，

²³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 USIS Taipei to USIA, "Survey of Taipei Chinese-Language Publication: *Literary Review*," February 5, 1960, Box2, E-5 Press & Publications-Feature MA Terial,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wan: U.S. Embassy, Taipei: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 Classified Alpha-Numeric Subject Files, 1957-1961, RG84, NARA.

²⁴ 同註 7，頁 218。

²⁵ 《自由世界畫報》（*Free World Pictorial*）是台北美新處所出版單頁、半月的海報，編輯和印刷都在台北。每一期出版 9,000 份，其中 8,705 份在台灣流通，其他則送至越南、泰國、馬尼拉、香港和 USIA。第 1 期於 1957 年 9 月 1 日出版，隨後逐漸增加閱讀人口。後來，台灣省文宣部學習美方的《自由世界畫報》的版型，另外出版《台灣畫報》（*Taiwan Pictorial*）。王梅香，〈McCarthy 與美新處在台灣的文化冷戰〉，「媒介現代：冷戰中的台灣文藝學術研討會」論文（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2013 年 5 月）。

²⁶ 同註 15。

但一直未獲直接的證實。而本研究所引述的資料，可以為余光中的說法提供直接證據，即是美新處報告中所言：「《文學雜誌》是台北美新處『隱蔽』的中文月刊」。「隱蔽」(unattributed)是美新處公文中出現頻率相當高的單字，亦可譯為「無法歸因」或「不知道來源的」，是新聞學領域的詞彙。在宣傳研究中，宣傳者為了不使真正的目的曝光，以及為了更有效的達成目標，宣傳者經常希望能隱藏身分²⁷。易言之，從美方的角度來看，《文學雜誌》「不能」被發現是美國人計畫的一部分，或是作為文化宣傳計畫的一環，而應該被「單純」理解為台灣作家的「自發行為」。而且誠如美國人自己所設想的，《文學雜誌》確實一直都被理解為是學院派作家們的文學夢想或是突發奇想，而不是美國針對東南亞進行政治宣傳的計畫構想。

《文學雜誌》的創刊不純然是台灣作家的自發行為，而是「美國人的建議」。從 McCarthy 的年度報告中，更直接證實這項說法。McCarthy 對於《文學雜誌》的描述如下：

USIS support to this Chinese literary magazine, begun in 1956 by a local publisher **at our suggestion**, always was confined to the purchase of 2,000 copies per issue **at a special discount** for distribution to nine other posts.....²⁸

(粗體、底線為筆者所加)

美國新聞處支持該中國文學雜誌，在我們的建議下，出版商（按：劉守宜）於 1956 年開始出版這份雜誌，台北美新處總是以特別折扣每期購買兩千本發送其他九個美國新聞處……

McCarthy 報告的這段陳述，有三個地方需要注意。首先，McCarthy 說明《文學雜誌》是美國新聞處所「支持」的「中國文學雜誌」，這項記載證實余光中所說《文學雜誌》得到美國人的扶掖。其次，美國人不只出錢，而且《文學雜誌》是在「我們」（美方）的建議下創辦的。這裡的「我們」是相當值得考慮之處。這份報告的

²⁷ Garth S. Jowett and Victoria O'Donnell 著，陳彥希、林嘉玫、張庭譽譯，《宣傳與說服》（台北：韋伯文化，2003 年），頁 42。

²⁸ Field Message, USIS Taipei to USIA, "Publications Annual Report (January-December, 1960)," March 28, 1961, Box2, E-9 Press & Publications-Reports,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wan: U.S. Embassy, Taipei: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 Classified Alpha-Numeric Subject Files, 1957-1961, RG84, NARA.

書寫者是 McCarthy，所以，根據上下文推斷，此處的「我們」應該是指「台北美新處」。有別於既有的文學史論述：《文學雜誌》的創辦源自學院派知識分子的構想，McCarthy 在對美國新聞總署的報告中，直接指稱《文學雜誌》是台北美新處的「建議」。因此，本研究試圖呈現學院派和美新處對於《文學雜誌》創辦緣起的不同觀點和認知。在更多的證據證實上述三者的關係之前，至少可以說，對學院派知識分子而言，台北美新處讓他們心中的文學夢想具體落實，然而對於台北美新處來說，他們考慮的卻是東南亞的文化宣傳。最後，《文學雜誌》能夠持續下去，和美國人每期購買兩千本分送海外九個美新處有極大關係。以《文學雜誌》一期印刷 4,500 份，台北美新處等於購買接近一半的數量，再加上 2,500 本以商業管道銷售，等於確保該雜誌的銷售狀況無虞。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人是以「特別折扣」購買《文學雜誌》，易言之，美國人並非台灣作家們一直認為的「一擲千金」，相反地，他們是相當經濟理性、錙銖必較的。試圖用最少的金錢，達到最大的文化宣傳效果。

整體而言，可以說《文學雜誌》作為戰後台灣英美現代主義的開始，而這個開始，是由美新處建議的、支持的。如此我們今日才得以明白《文學雜誌》和美新處真正的關係：美新處從一開始雜誌的創刊，以及最後雜誌的海外傳播，都可以看到美力的痕跡。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美國人所追求的「隱蔽」的狀態確實是成功的，如果說美國權力作為一種「隱蔽權力」(unattributed power)實在不為過。

第二部分，對於台北美新處而言，《文學雜誌》的功用有二：一是證明自由中國是自由世界中文的中心。在 McCarthy 年度報告中，台北美新處直接點出《文學雜誌》一開始建議創辦的主要原因，以及這份雜誌能夠達成的作用：

The magazine was designed originally to recruit Chinese writ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contribute to it to show that Free China is the center of the Chinese-language literary scene. For some years, this idea was carried out; *Literary Review* published analytical and critical articl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by competent scholars, and stories, essays, and poems by creative writers.²⁹ (粗體、底線為筆者所加)

²⁹ 同註 28。

該雜誌原先設計的目的，是徵募來自世界各地的中文作家，由他們出力、貢獻，以展示自由中國是中文文學的中心。這些年來，這個想法被實現，《文學雜誌》由稱職的學者發表關於中國文學和歷史的分析、批判文章，以及具有創意的作家發表小說、散文和詩。

根據美方原初的內容設計，《文學雜誌》創辦的目的是吸收中文作家，透過他們的創作，希望自由中國的文藝能夠成為中國文學的中心。因此，觀察《文學雜誌》，可以發現該刊登載不少有關中國文學的評論文章，可以說《文學雜誌》創辦的目的是追求「中國性」(Chineseness)，但也隱含反共、對抗的企圖和目標，並非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不涉政治」的「藝術性」。更直白的說，現代主義並不是美方原先的主要考慮，也不是夏濟安原來的設想³⁰，美方想要的是這群自由中國的作家，能夠寫出有別於共產中國的「創意寫作」(creative writing)。至於什麼才是「創意寫作」？很明顯地，接受以西方現代主義為主的譯介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管道，而這也是透過美新處提供外國文學的翻譯材料所達成。總此，《文學雜誌》除了用來證成進步、現代的中國性之外，還具有反共的實質目的。附帶一提的是，美方的目標，與當時台灣省新聞處 (Taiwan Information Department, 簡稱 TPID) 的目標是一致的，就是讓世人明白台灣在文藝上的進步 (Taiwan's achievements)³¹。

《文學雜誌》的第二個功用是作為美國文化冷戰宣傳的媒介 (medium)，其對象是東南亞 (包括台港) 的知識分子。Bottorff 評估報告中指出：

The intended audience of this magazine, as the word “Literary” implies, was to be the “intellectuals”—mostly teachers and students.³²

³⁰ 根據許俊雅的研究，《文學雜誌》在「創刊號」上的主張和西方現代派的主張相去甚遠，內容有不少偏向十九世紀西方批判現實主義的文章。夏濟安原先樸實的主張和後來《文學雜誌》的發展並不完全相符。同註 8，頁 55。

³¹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 USIS Taipei to USIA, “A Review of Taiwan Information Department Activities”, December 19, 1960, Box2, E-1-2 Press & Publications (Locally Originated Fast News),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wan: U.S. Embassy, Taipei: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 Classified Alpha-Numeric Subject Files, 1957-1961, RG84, NARA.

³² 同註 23。

正如刊物名稱「文學」所暗示的，這個雜誌預期的讀者是「知識分子」，主要是教師和學生。

台北美新處之所以需要創辦《文學雜誌》，以吸引東南亞知識分子，乃是從美國在東南亞的宣傳運作來考量。「海外華人教育問題」(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Problems)一直是美方所關切的項目，尤其是海外華人學生的升學問題(高中畢業升大學這個階段)。吸引東南亞學子選擇自由世界而非共產中國就學，一直是美方的宣傳重點，而透過文化宣傳是當時最便捷的方式，《文學雜誌》和《現代文學》傳播到東南亞，展現自由中國學子在思想和文藝上的創意和進步，具有呼應美方吸引海外華人的實質目的和效用。根據東南亞地區的美新處給台北美新處的回應，Bottorff 在報告中提到：

We found from the answers, however, that the consensus seemed to favor the continuation of USIS Taipei's support of the magazine, for all responding posts agreed that *Literary Review* is valuable as a medium to reach the overseas Chinese elite, although the audience it serves is small. Perhaps most presentative was the opinion of USIS Saigon saying that "a *Literary Review*-type magazine has a definite place in the Chinese-language publication program."³³

然而，我們（按：台北美新處）從問題的答案中發現，所有回應台北美新處的其他美新處的共識，似乎都是「贊成」台北美新處延續對於該雜誌的支持，這些美新處都同意，雖然《文學雜誌》相對其他美新處刊物顯得小眾，但是對於吸引海外中國菁英是一個有用的媒介。也許最具代表性的是西貢美新處的意見：《文學雜誌》類的雜誌在「中文出版計畫」中應該占有一定的位置。

由此可知，《文學雜誌》雖然小眾，但是，東南亞地區的美新處仍肯定它在中文出版計畫中的重要性，這可從它在海外的傳播情況一窺究竟。Bottorff 的報告中

³³ 同註 23。

記載：《文學雜誌》一共印製 4,500 份，在台灣透過商業管道銷售 2,500 份，東南亞各地美新處定期收到 1,930 份，包括：泰國曼谷 5 份、香港 200 份、馬來亞吉隆坡 900 份、菲律賓馬尼拉 500 份、柬埔寨金邊 50 份、越南西貢 100 份、韓國漢城（今名首爾）100 份、新加坡 5 份、寮國永珍 20 份和日本橫濱 50 份。在 1959 年 11 月 4 日之前，新加坡一向都是固定收到 250 份，之所以數量驟減，乃因新加坡政府對於華文刊物的禁書令³⁴。從這份數據來看，整個《文學雜誌》的傳播範圍，就是美援文藝體制下的東南亞區域，當然，除了日韓屬於美國東北亞的文化宣傳區域外，《文學雜誌》在美方的文化宣傳計畫中主要行銷東南亞。誠如台北美新處所提的：

Our assumption had been that *Literary Review* has its place in the USIS program to reach a small but influential group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elite, but our survey was an attempt to see if this assumption was justified. Parenthetically, we should say that with a surprisingly large commercial sale (2500) on Taiwan itself, it is clear that our local objectives were being met by the magazine.³⁵

我們的設想是，《文學雜誌》在美新處的計畫中自有其一席之地，能夠接觸到一群小而具有影響力的海外中國知識分子，而我們的調查是試圖證明這樣的設想是否合理。附帶一提，該雜誌在台灣當地有令人驚訝的商業銷售量（2500），很明顯地，該雜誌符合我們在當地的工作目標。

前述兩段引文告訴我們，《文學雜誌》是美新處計畫的一部分，它的目的是為了吸引海外華人知識分子。如果這是美新處的政治目的，那麼，《文學雜誌》在台灣透過商業管道每期售出 2,500 本，就是美新處希望透過在地出版商達成的商業銷售目標。綜合前述，美援文藝體制所展現的政治和經濟面向，有別過往對

³⁴ 有鑑於戰後殖民主對於殖民地的放任政策，五〇年代新加坡社會風氣不佳。1959 年，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更積極禁絕黃色、妨害社會道德、不良政治思想等的書籍，對於書籍的審查更趨嚴格。同註 23。

³⁵ 同註 23。

於美國權力一擲千金的「誤識」，其實美國人對於他們的出版品，以及其所能夠達成的效果非常審慎評估。除了基於政治上的目的而免費贈送外，美方希望其出版品皆能透過商業管道進行銷售，藉此降低美方所承受的宣傳經費壓力，同時，避免其宣傳品遭受政治宣傳的控訴。

第三部分，對於台北美新處而言，為了評估《文學雜誌》所達成的整體效果，美國人採用的是社會科學的調查方式，包括質化的敘述和量化的數字，透過發送海外問卷調查給接受《文學雜誌》的單位（一共有九個東南亞地區的美新處），再藉由其回應，以便台北美新處對該刊做出整體評估。1959年11月底，有五個美新處比較完整地填寫這份問卷，包括：菲律賓的馬尼拉美新處、新加坡美新處、越南的西貢美新處、柬埔寨的金邊美新處和寮國的永珍美新處。此外，泰國曼谷美新處提出一些寶貴的評論意見。最後，台北美新處蒐集、整理東南亞美新處的意見，回報予 USIA。這些問卷調查對於《文學雜誌》一共有下列四點評價：

第一點，《文學雜誌》被東南亞地區的美新處視為是能夠接觸華人知識分子的刊物。對此，各地美新處都陳述已見，如新加坡美新處提到：

While the subject publication appears to be playing a role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Students' Review* and the *World Today* in our Chinese program, it has been nevertheless playing a reasonably Chinese Literature...and at the same time dissuading them from reading certain leftist literary publications produced locally. **It should be realized that literature has been and still is an important field frequently exploited by Malayan Communists for their own ends.**³⁶（粗體、底線為筆者所加）

雖然《文學雜誌》所扮演的角色不及台北美新處出版的《學生英文雜誌》和香港美新處的《今日世界》重要，但是，《文學雜誌》在文學領域一直扮演相當的角色……同時，因為《文學雜誌》也能夠勸阻東南亞的讀者

³⁶ 同註 23。

閱讀當地生產的左翼文學出版品。應該被意識到的是，文學一直是被馬來亞共產黨利用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領域。

《文學雜誌》在美方計畫中的重要性，就是它能作為防止東南亞的讀者閱讀左翼文學作品，達到文學上反共的效果。同樣地，McCarthy 在年度報告中，提及已經停刊的《文學雜誌》，同樣地也和其他美新處的出版品進行比較。例如：《蕉風通訊》(Banana Wind Newsletter)、《豐年》以及《中學生》(High-School Student)³⁷。在其中，可以看到《文學雜誌》和給農民閱讀的《豐年》是相提並論的，因為都是由美方規劃、出資，然後由在地文化人編輯的刊物。

第二點，關於《文學雜誌》內容難易度的評估，海外的美新處並無達成共識。馬尼拉、永珍、金邊美新處覺得內容難易適中，西貢和新加坡美新處則認為偏難。新加坡美新處指出：《文學雜誌》的內容對於當時馬來亞華文學校的中學生來說是偏難的 (abitheavy)³⁸。至於各地區的讀者偏好也不盡相同，新加坡和越南偏好中國文學和美國文學，馬尼拉則認為文學批評是實用的 (useful)，金邊則認為中文創作對讀者而言是實用的。

第三點，海外美新處給予《文學雜誌》的整體建議，這方面的意見五花八門。包括有的美新處覺得《文學雜誌》太像教科書，有的認為封面應該再加以藝術的設計等，不一而足。其中有兩個意見值得特別重視：一是新加坡、金邊美新處都提到：《文學雜誌》被當地中文教師拿來作為上課的教材，而且受到當地中學生的歡迎，這是《文學雜誌》在台灣文壇之外，對於東南亞華文教育所發揮的影響力³⁹。釐清《文學雜誌》在冷戰時期發揮的海外文學教育的影響力，可以補充既有對於《文學雜誌》的認識。劉紹銘曾指出：「『文雜』銷路不廣，先生交游不大，故先生的學問修改和在中國文學的影響力，除了他小圈子內的朋友和他教過的學生外，一般職業作家對先生非常隔膜。」⁴⁰劉紹銘所言強調的是《文學雜誌》的學院、菁英屬性，然而，在台北美新處對東南亞的文化宣傳下，該刊

³⁷ 同註 28。

³⁸ 同註 23。

³⁹ 同註 23。

⁴⁰ 劉紹銘，〈懷濟安先生〉，收於夏濟安先生紀念及編印委員會編，《永久的懷念》(台北：夏濟安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1967年)，頁 77。

的影響對象從國內菁英擴展到海外華人知識分子，在此時期，海內外的青年學子透過《文學雜誌》學習寫作、閱讀翻譯作品以及想像中國文學的樣貌。

另一個值得重視的意見，是菲律賓馬尼拉美新處的建議。該單位認為《文學雜誌》在材料的選擇方面要更加注意，這一點值得特別提出說明。《文學雜誌》的材料除了作家創作的部分外，翻譯文學的部分，主要來自美國文學雜誌和美新處「資料與新聞服務」(Information Press Service, 簡稱 IPS) 的材料。以下即為美方報告中提到《文學雜誌》的材料：

The content, for the most part, consists of writings of outstanding Chinese scholars, usually short articles on developments of note in the Western world and comments on newly published books. **Translations of articles from American literary magazine and of IPS materials are also included.**⁴¹(粗體、底線為筆者所加)

大體上而言，《文學雜誌》的內容由傑出中國學者創作，通常是西方世界發展值得注意的短篇故事，以及剛出版的新書評論。翻譯的文章則從美國文學雜誌和美新處 IPS 資料取得。

上述這段話，主要針對《文學雜誌》的「內容」進行分析。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翻譯文章的部分，前文提到，《文學雜誌》上的翻譯文章，有部分來自美新處「資料與新聞服務」提供的資料，更進一步說明，美新處不僅對《文學雜誌》有金錢上的贊助，還有「刊物內容」上的資料提供⁴²。因此，可以理解「《文學雜誌》有不少的譯文是從當時最新的出版物中立即反映翻譯過來的，對於當下歐美文壇的介紹與分析能初步掌握。」⁴³從美新處取得翻譯的原文具有下列

⁴¹ 同註 23。

⁴² 美新處提供資料給《文學雜誌》並不是特例，其他雜誌社也有主動要求美新處提供資料者，比如說《國際現勢》(Kuo Chi Hsien Shih) 這份刊物，希望取得美新處中文的新聞稿件。Operations Memorandum, USIS Hong Kong to USIS Taipei, "Chinese Language Press Packet," June 8, 1961, Box2, E-1-2 Press & Publication (Locally Originated Fast News)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wan: U.S. Embassy, Taipei: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 Classified Alpha-Numeric Subject Files, 1957-1961, RG84, NARA.

⁴³ 同註 8, 頁 57。

的「好處」：一是可以使用美新處現成的原文資料，二是這些資料毋須擔心版權的問題，因為美方特別重視版權（copyright）取得的合法性。所以，能夠為《文學雜誌》所用的美國雜誌內容，必然都通過版權的取得，這對當時在台灣從事譯介的翻譯者和出版商而言，是最為便捷的方式。然而，此種方式是「方便」也是「侷限」，意味著在地譯者取得這些美國原文雜誌的同時，在版權和意識形態上亦是通過美新處、美國新聞總署的篩選和同意，更可以看到《文學雜誌》的翻譯內容和美新處意識型態的相關性。

最後一點，便是對於《文學雜誌》在傳播方面的整體評估。在東南亞地區，幾乎所有的《文學雜誌》都是透過贈予的方式傳播，而教師和學生是主要的接受者。美新處透過學校、組織、文化團體以及個人贈閱的方式，對此，美新處做出一個詳盡的《文學雜誌》傳播表格⁴⁴：

Audience	Manila	Singapore	Saigon	Phnom Penh	Vientiane	Average
Teachers	77%	20%	80%	70%	35%	45%
Students		80%	20%	10%		32%
Community Leaders	3	-	-	-	10	3
Nonschool Intellectuals	20	-	-	-	30	10
Others	-	-	-	20	25	5
Total Number of Copies	500	250	100	50	20	920

根據表格，可以發現：以《文學雜誌》海外傳播的對象來看，幾乎都是東南亞地區的「教師」，占了總傳播數量的一半以上。但是，在新加坡卻是以學生為主要的接受對象。此外，在寮國永珍，接受者並不特別集中在校園，非校園的知識分子也占了三分之一的比例。

⁴⁴ 表格出自：Foreign Service Despatch, USIS Taipei to USIA, "Survey of Taipei Chinese-Language Publication: *Literary Review*," February 5, 1960, Box2, E-5 Press & Publications-Feature MA Terial,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wan: U.S. Embassy, Taipei: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 Classified Alpha-Numeric Subject Files, 1957-1961, RG84, NARA.

至於《文學雜誌》在東南亞的傳播情況，還可以從其他美新處往返的公文中一窺端倪。如 1957 年，泰國曼谷發文給台北美新處，希望能夠繼續收到台北美新處的若干刊物，其中包括《豐年》、《自由中國之工業》、《學生英文雜誌》、《台灣》和《文學雜誌》等。McCarthy 針對泰國的需要增減一些雜誌，如《豐年》，由 40 本加到 200 本；《自由中國之工業》從 50 本加到 250 本；《學生英語雜誌》從 1,200 本降為 1,000 本；《文學雜誌》從 200 本減為 100 本。從泰國美新處對《文學雜誌》需求的減少，可以看到《文學雜誌》在泰國的接受度並不大，換句話說，還是比較實用的農業、工業方面的雜誌受到歡迎，而《文學雜誌》在泰國的情況，還是小眾的⁴⁵。

總體而言，《文學雜誌》在美新處的文化傳播中具有「小眾」和「菁英」的特質，因此它在東南亞的傳播量每況愈下。目前文學史對於該刊停刊的原因歸諸於夏濟安赴美，或是根據第一小節中吳魯芹的說法《文學雜誌》最後在麻將桌上「草草收殮」的。但 McCarthy 的報告是如此看待停刊，他說：

However, we withdrew our support as of July 1960 because of the magazine's failure to maintain high editorial quality, which came about gradually after the departure of its editor, Prof. T. A. Hsia, for a teaching appoin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⁴⁶

然而，我們於 1960 年 7 月撤銷我們的支持，是因為這份雜誌無法維持高的編輯品質，在它的編輯夏濟安在美國取得教職離開台灣之後，雜誌的狀況逐漸每下愈況。

因此美方撤銷對於《文學雜誌》的資助，的確與夏濟安赴美有關，然而其背後的原因是《文學雜誌》無法維持原有的編輯水準。不過對照 Bottorff 在停刊前的評估報告，該報告書肯定《文學雜誌》的貢獻，而且幾乎都是正面的褒揚，

⁴⁵ Operations Memorandum, USIS Bangkok to USIS Taipei, "Chinese Publications: Request for Information, Renewal of Shipments, and Increase in Volume," August 14, 1957, E-1-5 Press & Publications-Local Press 1958-1961, Alpha-Numeric Subject Files, 1957-1961, Box2, RG84, NARA.

⁴⁶ 同註 28。

可以看出當時台北美新處代理處長 Bottorff 極力想要爭取該雜誌的延續。然而，在同一份報告中，可以看到這份雜誌真的偏向菁英和小眾，而無法達到像《學生英文雜誌》和《今日世界》那樣的普遍化、大眾化，發揮更廣大的文化宣傳影響力，本研究認為這才是導致《文學雜誌》結束的真正原因。從《文學雜誌》的停刊，其實可以看到美方在文化宣傳上的經濟理性，審慎評估該刊能夠為美國外交政策帶來什麼「效果」(effectiveness)，如果效果有限，便會予以停刊⁴⁷。所以，對美國人來說《文學雜誌》並非如吳魯芹所說「草草收殮」的，而是經過精確的調查、理性的計算和審慎的評估。總之，《文學雜誌》一開始或許是學院派知識分子的文學夢想，也是台北美新處的「建議構想」，但該刊在美國人的計畫下真正展開，也實質地為美方進行東南亞的文化宣傳，最後，也在美國人實際的效果評估後畫上句點。

三、美援文藝體制下的《現代文學》

《文學雜誌》結束之後，台北美新處並沒有創辦其他文學雜誌，以彌補《文學雜誌》在文化宣傳上的空缺。但基於東南亞華人知識分子對於中文書籍閱讀的需求，加上共產中國持續在東南亞進行大規模的文化宣傳，因此，台北美新處對於東南亞的中文宣傳計畫似乎不能停歇。除了美新處支持和生產刊物之外，運用台灣在地已經編輯印刷完成的雜誌以為己用，是最為便捷的方式。一方面，美新處毋須再投入經費於出版中文雜誌的事務上；另一方面，六〇年代以後，台灣在地雜誌的出版品質和量已經能獨當一面，可以為台北美新處所用，換個角度思考，台灣在地的出版刊物，也是透過台北美新處更容易躍上世界的舞台。

1961年6月12日，台北美新處發文給新加坡美新處，內容是台北美新處為新加坡美新處訂購了1961年5月24日公文中提到的雜誌（如下表）⁴⁸，訂閱期

⁴⁷ 附帶一提的是，《豐年》雜誌為於1960年9月改由農復會自己辦理，其實也與美方這種經濟理性的思維有關，美方撤出對《豐年》的支持，是因為台灣農民已經不是美方的目標(target)了。同註28。

⁴⁸ 資料出處：Operations Memorandum, USIS Taipei to USIS Singapore, "Chinese Language Periodicals," June 12, 1961, Box2, E-1-2 Press & Publications (Locally Originated Fast News),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wan: U.S. Embassy, Taipei: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 Classified Alpha-Numeric Subject Files, 1957-1961, RG84, NARA.

間是一年。在這份公文上，可以看到台北美新處已經訂閱《現代文學》，而這個時間點是早於歐陽子所說的《現代文學》雜誌的經濟危機（1961年7月）⁴⁹，也早於後來 McCarthy 對於《現代文學》的贊助（1961年11月15日），但這段歷史幾乎不曾為《現代文學》社的成員所提及。易言之，在 McCarthy 正式贊助《現代文學》雜誌之前，台北美新處已經訂閱了《現代文學》並送到東南亞（新加坡）。

Magazine	Quantity	Total Cost (including mailing)
<i>Popular Science</i> 《大眾科學》	19	US\$39.38
<i>Apollo</i> 《文星》	19	22.50
<i>Rambler</i> 《自由談》	15	36.45
<i>Literary Works</i>	19	36.60
<i>Modern Literature</i> 《現代文學》	4	31.12
Total		166.05

從公文中可以看到台北美新處扮演的角色，就是為當時台灣的出版商找尋海外市場，由台北美新處先行訂閱，然後轉送東南亞，但最終仍希望東南亞讀者可自行訂閱。換句話說，美新處扮演類似雜誌推廣者的角色，提供東南亞讀者「試閱」。台北美新處說：

It is understood by the publishers that this a trial period, hoping that persons receiving these magazines will later want to subscribe on their own. **Publishers were advised not to mention USIS in any transactions.**⁵⁰（粗體、底線為筆者所加）

出版商們很清楚現在是試閱期，台北美新處最終希望收到雜誌的人最後能夠自行訂閱。出版商被建議在任何交易上都不要提到台北美新處。

⁴⁹ 同註 17。

⁵⁰ 同註 48。

根據這段描述，可以看到台北美新處和在地出版商之間合作共生的關係。對台北美新處而言，東南亞的華人有閱讀中文書籍的需求；對台灣的出版商而言，有販售自身雜誌和書籍的需求，兩者巧妙地達成平衡。在這個運作的過程中，台北美新處希望出版商能夠「隱藏」美新處介入的事實。實際上，相對於香港美新處比較偏向雜誌和書籍的主要生產者，台北美新處在台港之間，一直主要扮演著刊物的傳播者。所以，香港美新處的期刊（比如說《今日世界》和《小說報》），從香港船運到台灣的台北美新處，然後再發送出去，主要是轉往東南亞⁵¹。至於台北美新處生產和支持的雜誌，包括《學生英文雜誌》、《文學雜誌》等，其背後最主要的邏輯仍是自由中國在民主制度下成為美國在東亞的民主櫥窗（showcase），而這種進步，也表現在「文學」方面⁵²。

關於《現代文學》第 10 期（1961 年 9 月）、第 11 期（1961 年 11 月）受到美新處的贊助，《現代文學》成員都有提及，但是，卻很少人追問：被台北美新處贊助的《現代文學》最後到了哪裡？透過台北美新處和新加坡美新處之間的文件往來，可以清楚地看到受到贊助的《現代文學》雜誌流向。

1961 年 12 月 8 日，新加坡美新處發文給台北美新處，提到：

If the 500 copies of the 10th and 11th issues of Modern Literature have not already been shipped, we wish to request that they be sent directly to the persons on the attached list, **in no way attributed to USIS.**⁵³（粗體、底線為筆者所加）

如果《現代文學》第 10 期和第 11 期尚未寄出，我們希望能要求這些雜誌直接寄給列舉的名單，而不要讓人得知是美國新聞處所為。

⁵¹ Outgoing Telegram, USIS Taipei to Secstate Washington, March 17, 1961,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wan: U.S. Embassy, Taipei: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 Classified Alpha-Numeric Subject Files, 1957-1961, RG84, NARA.

⁵² Operations Memorandum, USIS Taipei to USIS Singapore, "Publications Distribution in Singapore," September 2, 1960,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wan: U.S. Embassy, Taipei: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 Classified Alpha-Numeric Subject Files, 1957-1961, RG84, NARA.

⁵³ Operations Memorandum, USIS Singapore to USIS Taipei, "Chinese Periodicals," December 8, 1961, Box2, E-1-2 Press & Publications (Locally Originated Fast News),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wan: U.S. Embassy, Taipei: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 Classified Alpha-Numeric Subject Files, 1957-1961, RG84, NARA.

由此可以看到，一直為《現代文學》成員所提到的 McCarthy 贊助的期數，最後將送往東南亞，而且，新加坡美新處還特別強調，希望由出版社直接寄出，最好「不要讓人聯想到美國新聞處」。新加坡美新處特別強調此項作為要不為人所知，應該有下列兩個理由：一是當時進入新加坡所有中文印刷品都必須經民政事務局檢查，如被得知是美新處傳播的刊物，可能會被視為宣傳品，而有通過檢查的困難。所以，新加坡美新處認為，由出版社直接寄予讀者，再加上《現代文學》屬於文學雜誌，通過檢查應該不困難⁵⁴。二是因為美新處對於這些雜誌的贊助或是獎掖，一貫的立場就是「隱蔽」，亦是前述從事宣傳工作的要點，就是隱藏宣傳者的身分，因此，希望透過在地出版商作為中介權力，而淡化美方對於文化宣傳的介入。

1961年12月15日，台北美新處回覆新加坡美新處，說明《現代文學》雜誌由現代文學雜誌社以平郵（surface mail）直接寄出，一共有五百本，被送到新加坡給20位的讀者（請參見文後附錄），這20位主要接受者中，有13位在新加坡，其他7位當時是屬於英國的前殖民地北婆三邦——砂勞越、汶萊等。這些讀者的身分大多是學校老師，再透過這些老師將《現代文學》傳播出去⁵⁵。所以，如果美方檔案的記載無誤的話，當年這些《現代文學》雜誌是由該社的同仁自己寄出的，那麼，《現代文學》的成員理應知道這些雜誌的去向。

總此，可以看到台北美新處為台灣出版的刊物扮演海外推介和傳播的角色，而這樣的作為，是以讓海外讀者認識「自由中國」的目標為前提。透過《現代文學》的傳播，及台北美新處與新加坡美新處往來的文件，可看到新加坡美新處建議台北美新處應該讓台灣的出版社「自己」（independent of USIS）尋求海外的市場，不管是在新加坡和英屬婆羅洲（British Borneo）。但是，在六〇年代的台灣，這誠非容易的事。一方面，有政治敏感的考量，任何中文刊物要進入新加坡，必須經過新加坡檢查制度⁵⁶。此外，還有海外匯款的考量要解決⁵⁷。

⁵⁴ 同註 53。

⁵⁵ Operations Memorandum, USIS Taipei to USIS Singapore, "Chinese Language Periodicals," December 15, 1961, Box2, E-1-2 Press& Publications (Locally Originated Fast News),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wan: U.S. Embassy, Taipei: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 Classified Alpha-Numeric Subject Files, 1957-1961, RG84, NARA.

⁵⁶ Operations Memorandum, USIS Singapore to USIS Taipei, "Chinese Periodicals", December 8,

基於上述理由，六〇年代台灣出版業者，若是想要拓展海外市場，也就是本研究在一開始夏濟安和吳魯芹跟劉守宜說的「格局」要大，如果他們口中的「格局」是指海外市場的話，無疑地，透過台北美新處是尋求海外市場阻力最小的一條路。

四、結語

釐清這段歷史之後，可以回頭看看麻將桌上的談話，為什麼夏濟安、吳魯芹希望劉守宜的明華書局「格局」能夠大一點？這裡的「格局」是什麼意思？透過本研究，這個「格局」除了是文學的格局，追隨英美現代主義的路線，也許是文學傳播的格局，從台灣出發，行銷到整個東南亞。誠然，這種透過美國新聞處的文學傳播，絕非僅是一種文學、文化的交流而已，美新處運作背後更深層的目的是美蘇冷戰下的政治對抗，而美國人選擇一種「純粹美學」、「非政治」、「超功利」的雜誌，作為它對自由世界最「隱蔽」的宣傳。

如果《文學雜誌》背負著美方重要的文化宣傳使命，那麼，吳魯芹在〈瑣憶《文學雜誌》的創立與停刊〉一文中提到的這段話，或許值得重新考慮。他說：「《文學雜誌》不是在『負有時代使命』或者『啟迪後進』的嚴肅氣氛下產生的。」⁵⁸透過本研究，即便吳魯芹等行動者本身不作如此想，但是，對於美國人而言，《文學雜誌》的確是「背負時代的使命」而產生的，亦即這份雜誌是為了反共宣傳而生，也確然在東南亞的中學生身上發揮「文學教育」的功能。只是，《文學雜誌》在東南亞的文學教育上曾經發揮的影響力鮮少被提及，比較為人所熟知的，是《文學雜誌》開啟學院派文學社群的文學實踐，更影響了後來的《現代文學》。

1961,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wan: U.S. Embassy, Taipei: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 Classified Alpha-Numeric Subject Files, 1957-1961, RG84, NARA.

⁵⁷ Operations Memorandum, USIS Taipei to USIS Singapore, "Chinese Language Periodicals", December 15, 1961,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wan: U.S. Embassy, Taipei: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 Classified Alpha-Numeric Subject Files, 1957-1961, RG84, NARA.

⁵⁸ 同註 2。

我們可以做一個比喻，蔣夢麟和美新處合作的《豐年》雜誌，是為了給台灣的農民看的；那麼夏濟安和美新處合作的《文學雜誌》，是為了給東南亞的知識分子閱讀的。正是在美蘇對立、冷戰宣傳競爭的背景下，《文學雜誌》、《現代文學》為美新處所用，如果《文學雜誌》、《現代文學》是台灣戰後英美現代主義發展的主要軸線，在這條軸線中，我們看到美麗（美力）的痕跡，回答該問題，可以更具體地解釋陳芳明所說的「戰後美援文化與英美現代主義的掛勾」是怎麼一回事。誠然，美新處的目的不是「文學」，而是「政治」。更延伸來看，台灣英美現代主義在 1956 年之後和美援文化的關係，英美現代主義是從「美國冷戰文化宣傳」中發展起來的。台灣英美現代主義是因為了反共、宣傳而生，但在行動者的公開宣稱中，卻是以純文學、反對反共的純粹美學與樹立嚴肅文學的面貌出現⁵⁹，因此可以說，至少從美新處的角度來看，台灣英美現代主義是一種文化冷戰宣傳下的反共現代主義。

總此，本研究認為美援文藝體制下的《文學雜誌》與《現代文學》，具有以下幾個重要的意義：首先，重新釐清《文學雜誌》作為美援的刊物之一，而且是台北美新處強調的「隱蔽」的中文刊物。其次，前者創立的目的，原本就是為了東南亞的中文文化宣傳，預設的對象是知識分子。至於後者，則是由在地文學社群創辦，其中兩期後為美新處作為文化宣傳之用。對美新處而言，這兩份雜誌的政治性、宣傳性、教育性超過文學上的重要性。最後，透過解答《文學雜誌》的身世之謎，或許可以做出這樣的宣稱，戰後台灣英美現代主義的開始，其實是在美援文藝體制的文化宣傳下開始，美方想的是政治，而台灣知識分子追求的卻是文學。在這種美方與在地知識分子同床異夢的情況下，一種文化冷戰的、作為反共宣傳的現代主義在台灣知識分子身上誕生了。

⁵⁹ 同註 40。

附錄



UNCLASSIFIED

- Mr. Tai Shih-chung 戴始仲 50 copies
11 Illoyd Gardens
Singapore 9
- Mr. Tan Pek Thong 陈别同 50 copies
Singapore Thong Guan Kong Hui
199-B New Bridge Road
Singapore 1
- Mr. Cheng Ann Lun 郭安倫 50 copies
Chinese High School
673 Bukit Timah Rd.
Singapore
- Mr. Lim Hong Teik 林逢德 50 copies
Happy School
67-69, Lorong 14
Gaylang,
Singapore 14
- Mr. David Tseng 曾慶正 30 copies
609 Changi Road
Singapore 14
- Mr. T.C. Tung 仝道章 20 copies
48 Crowhurst Drive
Singapore 19
- Mr. Tan Keng Chiew 陈景昭 20 copies
Tuan Mong Middle School
97 Tank Road
Singapore 9
- Mr. Tan Kong Peng 陳光平 10 copies
19-B Lorong 30
Singapore 14
- Madam Liu Yun Sen 劉韻仙 20 copies
Nanyang Girls' High School
52 King's Road
Singapore 10
- Mr. Tong Soo Ching 唐史青 20 copies
Kheng Chean School
6/6-A Derbyshire Road
Singapore

UNCLASSIFIED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7-429851

Authority: CLIC MAN 3-31-14

- 2 -

UNCLASSIFIED

Mr. Liang Wen Huan 梁文煥 Jesselton Middle School Jesselton, North Borneo	50 copies
Mr. S. K. Cheng 郭西谷 Chung Ching Middle School Seria, Brunei	20 copies
Mrs. Ellen Cheng 曾國維夫人 Radio Sabah Jesselton, North Borneo	20 copies
Mr. Yeh Poh Tzu 葉保滋 Overseas Chinese Daily News Gaza Road Jesselton, North Borneo	10 copies
Mr. Chan Keng Tien 陳競天 Borneo Times Leila Road Sandakan, North Borneo	10 copies
Mr. Chia Tze Ching 謝子青 Chung Hwa Middle School, No. 3 Kuching, Sarawak	10 copies
Mr. Sun Kwang Han 孫光漢 修士 Maris Stella High School Siglap View Singapore 15	20 copies
Mr. Chang Shih Tien 張世典 修士 Catholic High School Queen Street Singapore 7	20 copies
Miss Yang Sui Chor 楊瑞初 Nan Hwa Girls High School 2 Addis Road Singapore 9	10 copies
Mr. S. K. Law 劉宜強 Sarawak Gov't Information Service Kuching, Sarawak	10 copies

UNCLASSIFIED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7-428681

h1-18-2
Authority: MW 5713-2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余光中，《茱萸的孩子》（台北：天下文化，1999年）。
- 吳魯芹，《低調淺彈——瞎三話四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6年）。
-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
- 陳若曦，《陳若曦自選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82年）。
- 夏濟安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永久的懷念》（台北：夏濟安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1967年）。
- Garth S. Jowett and Victoria O'Donnell 著，陳彥希、林嘉玫、張庭譽譯，《宣傳與說服》（台北：韋伯文化，2003年）。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 梅家玲，〈夏濟安、《文學雜誌》與台灣大學：兼論台灣「學院派」文學雜誌及其與「文化場域」和「教育空間」的互涉〉，《台灣文學研究集刊》創刊號（2006年2月），頁61-103。
- 許俊雅，〈回首話當年（下）：論夏濟安與《文學雜誌》〉，《華文文學》第54期（2003年1月），頁55-64。
- 陳芳明，〈台灣的族群飄移與民國記憶〉，《傳記文學》99卷4期（2011年10月），62-82。
- 陳建忠，〈「美新處」（USI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國文學報》第52期（2012年12月），頁211-242。

(二) 學位論文

- 李義男，〈美新處「學生英文雜誌」內容分析：該刊傳播目的與技術之探討〉（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70年）。
- 侯作珍，〈自由主義傳統與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崛起〉（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2年）。

(三) 研討會論文

- 王梅香，〈McCarthy 與美新處在台灣的文化冷戰〉，「媒介現代：冷戰中的台港文藝學術研討會」論文（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2013年5月）。
- 蔡明諺，〈製作豐年：美國在台灣農村的文化宣傳策略〉，「媒介現代：冷戰中的台港文藝學術研討會」論文（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2013年5月）。

三、報紙雜誌

- 白先勇，〈《現文》憶往：《現代文學》的資金來源〉，《聯合報》，2012年3月12日，第D3版。
- 余光中，〈愛彈低調的高手：遠悼吳魯芹先生〉，《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83年8月25日，第8版。
- 吳魯芹，〈瑣憶《文學雜誌》的創立與停刊〉，《聯合報》，1977年6月1日，第12版。
- 陳若曦，〈誰要辦《現代文學》？〉，《聯合報》，2011年11月12日，第D3版。
- 歐陽子，〈關於《現代文學》創辦時期的財務及總務〉，《聯合報》，2012年3月13日，第D3版。
- 鐘麗慧，〈老漢忘年不老·飛觴把酒言觀中距離訪問吳魯芹〉，《聯合報》，1982年8月7日，第7版。
- Malcolm Cowley 著，劉紹銘譯，〈論批評家影響下的美國現代小說〉，《文學雜誌》7卷1期（1959年9月）。

Peter Kline 著，葉維廉譯，〈艾略特戲劇的精神中心〉，《文學雜誌》7 卷 3 期（1959 年 11 月）。

William Barrett 著，朱南度譯，〈現代藝術與存在主義〉，《文學雜誌》6 卷 3 期（1959 年 5 月）。

William York Tindall 著，朱南度譯，〈現代英國小說與意識流〉，《文學雜誌》6 卷 5 期（1959 年 7 月）。

四、其他

國家檔案局（NARA）RG84 檔案。